

《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全编》将分三批次出版

首席记者 姜燕

在隆重纪念建党九十五周年之际,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与上海书店出版社合作,邀约党史、工运史和现代史专家对该室所藏的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重新编审整理,汇集成《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全编》(1921—1949),已被列为“十三五”期间国家重点出版项目,将分三个编次陆续出版,这对于重温光荣历史、加强传统教育,推动革命史、党史(特别是上海地方党史)的研究,均有重要意义。

上海工人运动史料目前已付诸落实的部分有三个批次。第一批次是按照行业或企业以及专题整理编纂的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计有《上海电力公司工人运动史料》、《抗日战争以来上海大百货公司工人运动》《上海四行二局的工人运动》等多篇;第二批次是《上海工运动态——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警务处情报选译(1918—1935年)》,该资料的主要收集者是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的翻译人员冯伯乐等人,他们前往当时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档案处(今上海市档案馆的前身),查阅其收藏的前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警务处情报后,选译其中与工人生活、工人运动有关的内容后誊抄而成,旨在为有关专家研究上海工人运动史作参考之用。

翻译手稿誊录在300格稿子上,共计有

3000页。从结构上看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系1918年至1931年,选译自警务处日报;第二部分是1932年至1935年,选译自警务处情报。每篇短者百来字,多者一二千字。警务处日报是工部局警务处编辑的日报,从1907年1月1日到1938年6月30日,每日一份,由警务处呈送总务处。其中记载了警务处各捕房辖区内发生的各种社会、政治和刑侦事件。警务处情报是警务处特务股编制的情报汇集,从1932年1月至1935年12月,属秘密性质,内容不对外公开,只有租界高级官员才能阅读。情报按政治、劳工、杂项、分类记载各种政治党派、团体在上海(特别是租界)的活动情况,以及工人罢工、市民抗捐,还有一些重要生活资料的情况。

第三批次是《大革命时期上海工运史口述资料》,全部为个别访谈后的记录整理,即口述历史,总计近400篇。

此外,当时该会曾对历年来收集到的1500万字的上海工人运动历史资料和1000余种历史文献、1600余幅历史照片,以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的武器、袖章;王孝和烈士的血衣、遗书等历史文物,按体裁和来源编过9本目录(见右图)。这些目录对于了解该会当时的工作业绩,以及今天妥善整理、充分利用相对应的文献资料,既有按图索骥的作用,亦是具有独特而重要价值的信息积累。所以《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所藏文献与文物目录汇编》的整理出版也将列入计划。



(上接 A6版) 五十多年前已采口述历史

“前几年说收集口述史,其实五六十年前,我们已经开始做这一工作了。”郑庆声说,当时组织访问了许多参加三次起义的老工人,作家协会有些作家也一起参加了采访。这些老人当时已五、六十岁,现在都已作古。

“记得沈以行曾对我说过,当年,北京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刘大年来沪与沈以行见面时,沈以行对他谈起访问老工人收集资料,刘大加称赞,说他们的研究工作都是从书本上找资料,而不是找活人收集资料。”

上海书店出版社文史编辑室主任完颜绍元说,口述资料将列在第三批次出版,暂名为《大革命时期上海工运史口述资料》,总计近400篇。有《王梅卿口述》《薛兆圣口述》《朱英如口述》《郑长山口述》《施小妹口述》《赵金英赵银英口述》等,内容率皆出自口述人亲历亲见亲闻,相当丰富。

“比如《郭旦夫口述》内容有五卅运动,1920年五一节,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五卅运动;《谢庆斋口述》内容有1925年商务印书馆的二次罢工,先施、永安、南货业、估衣业的罢工,上海总工会和全国总工会的活动,第一、第三次武装起义和四一二政变,本人的狱中斗争;《孙诗圃口述》的内容有五卅运动的一些情况,商务印书馆工会和党的关系,第一、二、三次武装起义和四一二政变,有关罗亦农、陈延年、赵世炎、何大同、章郁庵烈士的情况等。”完颜绍元说。

他特别提到,有些口述还保存了当时基层党组织用于宣传革命动员群众的文艺形式,如《施小妹口述》中有《纪念列宁更调》(更调,民间小调名,又名“五更曲”或“叹五更”,歌词共五叠,自一更至五更递转咏唱)《十把扇子小唱》等,多为不见于文字记录的口耳相传,弥足珍贵。

像“天书”一样的座谈记录

史料中保存有大量的访谈、座谈记录,有的还是用“天书”一样的速记方法记录。在一本简陋的练习簿下部写着“颐中烟厂第一次座谈会记录(速记)”,时间是1954年9月19日,记录者是倪慧英(见题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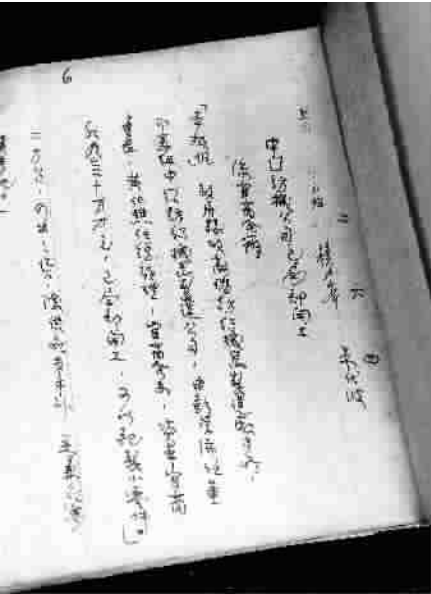
■ 许彦飞组织报社里的人将《新闻报》上有关工运的资料全部找出,用该报自制的专用稿纸抄录后送交工运史料委员会

1953年,刘长胜征得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刘骁的同意后,决定成立干事会,改变原来仅仅收集纸面资料的方式,由史料委员会人员出面联络现有产业部门举办座谈会。约请当时参与斗争的人(干部、老工人为主)来回忆、漫谈,或作访问谈话,加以详尽的记录,再参考有关报刊资料,据此整理成草稿,经开会讨论、反复修整,最后撰成初稿。

这段工作持续了2年时间,大家忙得热火朝天,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所以几位核心人物在回忆录中都有记述。郑庆声回忆:

“我们的做法是由这个单位的地下党负责人开具名单,按不同时期分头召开座谈会,由专人负责记录整理(史料委员会当时有速记员倪慧英和王天筠两人),并参考报纸记载和其他文字资料(查阅档案等)进行编写。由各系统地下党负责人出面召集,人员比较集中,因各系统的地下党员解放后均已分散在各个不同系统做领导工作,往往很难凑在一起,故一般均在星期天集中开会(当时没有双休日),所以当时有些同志开玩笑说,我们这些礼拜天都贡献给工运史料委员会了。”

沈以行在他的《50年代上海工运史料工



作回顾》一文中也写道:

“整个过程的工作量很大,但有的却进展迅速,例如在店职员方面,大约在半年内就写出了海关、银行、电讯、大百货、银钱业联谊会、保险业、职业妇女俱乐部、德士古(石油)、酱园业、酒业业、蚁社、华联同乐会等12个方面的史料,共开会百余次,参加者400余人,执笔者60人,成稿40万字。可以说是对店职员斗争史作了一次群众性的总结。参加此项工作者有许多是利用了业余时间和节假日。市政方面也有122人参加座谈,开会45次,十余人执笔,写出了电力公司(杨树浦发电厂)、英商电车、法商电车、电话公司等书稿。

从1954年2月起,经刘长胜同意,史料委员会在原定四个产业取得一定的经验后,又开辟了机器、棉纺、卷烟三个方面的采访,并选择若干重点工厂加以布置,力图就本厂范围各写一份职工运动的历史材料。由此,直至1955年,即前后大约2年的时间里,该会总共收集了7个方面的史料,召开座谈会274次,参加者940人,访问44人次,执笔者百余人,成稿刊印27种,160余万字。由于经过座谈互相印证核对,所以有很高的可靠性。1956年8月以后,根据我国十二年科学规划的要

求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编纂中国工人运动史的计划,史料委员会又制订了按历史时期全面收集和整理的方针。”

几十只空木箱装史料

郑庆声记得,1957年下半年,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还迎来了一批会讲中国话的日本朋友,共五、六位。这批日本朋友到史料委员会来了以后,由沈以行给他们上课,讲解上海工人运动的历史。除了学习之外,他们还帮委员会做了一些工作,如他们看了访问参加五卅运动、三次武装起义老工人的谈话记录,就帮着在记录前面作索引。这些日本朋友在工运史料委员会待了半年工夫,1958年上半年陆续回国。

其时,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的工作也接近尾声。1958年,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在上海视察工作时,听说上海市总工会内有个工运史料委员会很感兴趣,便向上海市总工会的领导提出,把工运史料委员会并到全总工会研究室去,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搁浅。

建国十周年时,市里曾计划在上海淮海路渔阳里东面拆掉一批沿街的房子,另建“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市委还成立了征集委员会,由党校副校长李佐长负责,集中了党校、高等院校的一批人,加上工运史料委员会的人,组成一个工作班子。

“工运史料委员会就此结束,准备搬家。”郑庆声回忆。当时商务印书馆有个老工人叫孙诗圃,常来工运史料委员会走动,听说委员会要搬家,还从茶叶进出口公司借给我们几十只装茶叶出口的空木箱,装了满满一卡车,运到党校。但最后纪念馆也不了了之。

“1960年底,市委宣传部任命沈以行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主持日常工作,随后又批准调姜沛南、徐同甫、倪慧英和我四人随同沈以行到历史所工作,并带去了全部工运史料。这都是后话了。幸运的是我们始终保存好我们辛辛苦苦得来的劳动成果——一大批珍贵的工运史料,今天能够陆续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这使我们感到极大的安慰。”

——郑庆声(《回忆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